

西伯利亚苏维埃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以弗谢·伊凡诺夫的《铁甲车》为例

徐 乐

内容提要 现代西伯利亚文学意识的觉醒有赖于十月革命的解放，在社会主义思想的推动下，西伯利亚文学家们回应时代的要求，重新认识和思考本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进入了俄罗斯苏维埃文学发展的总体进程。作为苏联初期西伯利亚文学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弗谢·伊凡诺夫反映内战题材的中篇小说《铁甲车》代表了西伯利亚苏维埃新文学的探索倾向，一方面继承俄罗斯文学的民族传统，论证民族革命的正义性质，另一方面以广阔的史诗画面展现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革命的世界意义，为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提供鲜活的艺术证明。

关键词 西伯利亚苏维埃文学 文学与革命 弗谢·伊凡诺夫 《铁甲列车》

—

自1581年叶尔马克率部入侵西伯利亚汗国以来，到十九世纪时，俄罗斯帝国不但在地缘上将西伯利亚纳入版图，而且试图将其作为某种概念纳入俄罗斯文化的共同体。但在十月革命前，帝俄政府始终视西伯利亚为“国内殖民地”，冷漠地对待该地区自身的需求和发展远景，甚至有意识地遏制它的文化进程。

西伯利亚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和政治流放息息相关。按照列宁的定义，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社会矛盾激化，革命解放运动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世纪末的‘极度混乱’（高尔基语）被开启了新的百年的‘巨浪’所替代，与此相伴随的是尖锐的思想斗争。而斗争的武器，正如以往经常的情况，是哲学、文学、艺术。”^① 西伯利亚尽管远离欧俄革命中心，但也经历了大致相似的革命进程。1905年第一次革命促发了大众政治意志的高涨，西伯利亚各地纷纷出版了自己的报纸、杂志、辑刊、文集，在一些边区文化中心成立文学团体。正是

^①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Глав. ред.,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ибири. Т. 1.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2, с. 509.

在十月革命前后，西伯利亚作家进入了俄罗斯总体文学的大框架。^① 与俄国总体的革命形势相应，西伯利亚的大多数作家一方面揭露当代社会的阴暗力量，另一方面也没有丧失革新生活的信念，更没有落入灰心绝望的境地。虽然革命后来自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逃亡者将现代主义的文学理念、批评方针和组织形式引入西伯利亚，也引起西伯利亚城市读者甚至游击队员们的浓厚兴趣^②，但总体来说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矛盾，使得西伯利亚作家们发展出稳重、勇敢、新颖而又健康明快、精力充沛的文学趣味，与当时俄国中心地区盛行的颓废主义、唯心主义仍然有着很大的区别。1919年西伯利亚本土的著名作家、记者斯捷潘·伊萨科夫在巴尔瑙尔创刊的杂志《西伯利亚曙光》第一期上评论说：“这一边区文学的特殊的西伯利亚的健康色调，是俄罗斯文学中新颖而鲜活的一个分支。”^③ 在革命意识和民族自觉的催动下，二十世纪初的西伯利亚作家们以新的眼光看待自己脚下的故土，不再单纯地将它视为终年积雪、荒无人烟的化外之地，或者沿袭十九世纪托尔斯泰（《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结尾）、列斯科夫（西伯利亚系列小说）的观念，把流放西伯利亚神话化为精神复活的神圣体验。年轻的西伯利亚文学家们对传统和现实做了艺术性的重新思考，不但看到这里的大自然的严酷，而且善于发现这大自然和在此生活的人所蕴含的丰富的美；不但真实客观地描写西伯利亚人的生存现实，而且竭力表现出他们多种多样的内心情感和理想追求。

十月革命后的十年，苏联作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创作，无论在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史上，还是在年轻的苏联文学史上，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苏联初期新老两代作家都在积极回顾、总结十月革命和内战的经验，为无产阶级的新兴政权和意识形态探索文化道路，论证苏联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摆脱经济、军事和社会危机，克服思想混乱，保卫和塑造社会主义强国的合法性，由此奠定了三十年代苏维埃人民建设新生活和新文化的基础。

十月革命后的国内战争和抵抗外国干涉的斗争极端残酷，充斥着流血和暴力，苏

①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Глав. ред.,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ибири. Т. 1.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ериод*,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2, с. 511.

② 未来主义的主张似乎更符合革命时期西伯利亚革命者和普通群众创造生活的心理冲动。“俄国未来主义之父”Д. 布尔柳克在西伯利亚大城市举办的画展对大众开放，引起轰动；属于“离心机”的Н. 阿谢耶夫和С. 特列季亚科夫1919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组建文学社团“草台班子”，1920年改名“创造”，1921年搬迁到赤塔，出版的杂志《创造》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广大地域拥有忠实读者；另外，马雅可夫斯基、赫列勃尼科夫的诗作，象征派大师勃洛克的《斯基福人》都在西伯利亚土地上广为传颂。См.: Плеханова И.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ибири. Часть 2*, Иркутск: Изд-во Иркут. гос. ун-та, 2010, с. 17.

③ Исаков С., «Сибирская муза», *Сибирский рассвет*, 1(1919), с. 50.

联人民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而内战中惨无人道的暴行在西伯利亚因为气候的严酷而更加激烈。1918年4月5日本军队和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海参崴，5月捷克军团在从伏尔加河到海参崴的广大地区发动叛乱，同时协约国纷纷增派远征军到西伯利亚，至11月外国干涉军在西伯利亚的人数达到十五万人。在帝国主义干涉国的支持下，原沙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鄂木斯克以全国最高执政、俄国陆海军总司令身份建立了独裁政府，对红军和一切支持苏维埃的平民展开了残酷的讨伐和镇压。虽然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但从乌拉尔到远东各处都开展了广泛的游击队运动，反对高尔察克和外国干涉军。西伯利亚的很多知名作家如弗拉基米尔·扎祖勃林和法捷耶夫等，都亲历了这场斗争，因此新的西伯利亚文学可以说直接诞生于国内战争的主题。1925年文学家维亚特金在评论西伯利亚诗人扎沃奇科夫在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诗集《苦涩的蜜》时写道：

“西伯利亚的文学青年在成长和壮大。……他们是革命诞生的诗人，经受了革命的严酷的火的淬炼，尝尽了它的苦涩的蜜。在他们每个人的诗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西伯利亚——既是拥有独特地理条件的国度，同时也是残酷的国内战争竞技场。”^① 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作为民族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既有着开天辟地建设新社会的英雄主义气概，也充满民族分裂的悲剧性体验，对它的复杂意义的文学呈现，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对自身民族性的深刻反思，从今日俄罗斯政府首脑和学者的表述来看，它至今依然是一个热点话题。

二

按照当代西伯利亚文学史家的看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把西伯利亚内战材料带入俄国，也是苏联文学史上当时最有才华的一位作家”^②，系西伯利亚的本土作家弗谢沃洛德·维亚切斯拉沃维奇·伊凡诺夫（Всеволод Вячеславович Иванов, 1895—1963）。他的中篇小说《游击队员》成为高尔基参与创办的杂志《红色处女地》第一期的开篇之作，而他更加知名的中篇小说《铁甲车》则发表在该杂志的第五期上。法捷耶夫将这两篇小说并誉为“苏联散文中的经典”^③。《铁甲车》的题材是伊凡诺夫在为铁甲车部队作报告时，受到部队军官讲述内战期间铁甲车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以及一则游击队夺取铁甲车的报道和一位传奇式游击队员、中国人沈彬吾的事迹所触

① Вяткин Г., «Критика и биография», *Сибирские огни*, 6(1925), с. 190.

② Плеханова И.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ибири. Часть 2*, Иркутск: Изд-во Иркут. гос. ун-та, 2010, с. 67.

③ Фадеев А., *За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57, с. 805.

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利用文件材料创作“事实的文学”，这一方法被苏联文艺团体“列夫”广泛宣传后，在无产作家中十分流行。虽然作品的写实性十分明显，但伊凡诺夫显然倾心于更大规模的概括性图景，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尽管故事发生在西伯利亚，发生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是虚构的，这也没有什么坏处，故事固然缺少因为亲身观察而得到的准确性（我从未到过远东），但它首先却也有了广阔的规模……”^①与之前其他作家的短篇小说相比，《铁甲车》写的已经是战争的全景。小说里的西伯利亚游击队并未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装备也十分低劣，但凭借布尔什维克的出色鼓动和领导、游击队员们的英勇精神和农民群众的热切支持，竟然拦截并且俘获了一列装备许多大炮、机枪、弹药，并且由一位经验丰富、尽职尽责的白卫军官指挥的装甲列车。如果让这辆列车施援城里的白军，对革命造成破坏的后果是难以估量的。由于游击队缺乏重型武器，无法有效地摧毁奔驰的铁甲车，战斗的关键便是如何诱使铁甲车自行停顿，此时加入俄国革命的在俄中国劳工沈彬吾自愿卧在铁轨上，让铁甲车从身上轧过，当机车司机下车查看时，立刻被埋伏的游击队击毙。正是沈彬吾的自我牺牲，将这辆对革命造成重大威胁的铁甲列车困在半路上，从而保证了城市起义的胜利。小说洋溢着英雄主义的激情，反映了革命对广大农民的启蒙意义以及觉醒了民众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这些因素立刻引起了当时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注意，斯大林甚至曾一度打算把作者树立为新时代的文化领袖^②。

除伊凡诺夫外，二十年代一批年轻的西伯利亚作家都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鼓舞，满怀热情地投入苏维埃新的史诗文学的建设。1923年，伊尔库茨克的杂志《红色曙光》发表了富于时代特色的西伯利亚文学宣言：我们的文学还在期待当代的、英雄主义的《伊戈尔远征记》的创作者……我们的文学期待自己的托尔斯泰……我们相信——这些艺术家从大地，从它的土壤深层走来，他们给将来的人们和我们留下饱蘸心血写成的、被时事的火焰淬炼的、关于不久前的可怕往事的篇章。^③

刚刚经受了战争考验的西伯利亚人渴望自己的二十世纪史诗，这是时代精神的要求。而一年前伊凡诺夫的《铁甲车》刚刚发表，俄国批评家立刻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篇作品的史诗元素，在标题为《新的高尔基》一文中，伊凡诺夫被称为“西伯利亚热情洋溢的诗人”：这个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给文学带来关于西伯利亚的深刻的、内

① 伊凡诺夫《铁甲车》，戴望舒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33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См.: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Никому не известный писатель 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4(2010), с. 390.

③ А Г., «Из мотив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расные зори*, 5 (1923), с. 147.

部的知识和敏锐的感觉。他为我们敞开了一幅西伯利亚画卷，囊括了它全部原初的鲜艳色彩、荷马式的雄浑浩大、不同语言的斑斓多姿和丰富生动的地域习俗，可以说，西伯利亚第一次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当代史诗的最初音符。^①《铁甲车》也毫无疑问地标志着西伯利亚苏维埃小说的重要发展阶段。

可是，如果认为这位为苏联文学形成起到重要作用的作家的笔触仅仅局限于西伯利亚当地的特殊生活场景和底层民众的自发感觉，便远远无法解释小说所呈现出来的苏联人的动态心理过程和整体生活的革命性变化。笔者认为，《铁甲车》描绘的西伯利亚革命，与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有着深刻联系，也体现了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的广泛传播和普遍接受的内在逻辑。一方面，它证明了西伯利亚作家处理地方风情和表现游击队斗争题材的能力；另一方面，它呼应了苏维埃文学共同的民族特点，即在某些特定的主题上探求和表现“民族的深厚根基”，揭示对整个苏维埃文学而言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作家后来也回忆道：“我们知道，恰恰是现在，出类拔萃的作家、诗人、音乐家和画家从西伯利亚走进了苏联文学。”^②

三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西伯利亚早期苏维埃文学作品有一个与俄罗斯民族性相关的突出特点，那就是赤裸裸地展示“农村生活的愚昧”，满足于呈现日常生活画面，突出西伯利亚农民的野蛮、保守、无知、迷信。在这些作品中，西伯利亚农民被表现得仿佛是懵懂天真的儿童，他们被反反复复的暴力所激发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如同野火一般，点燃了千百年来埋藏在人民心底的仇恨和某种破坏一切毁灭一切的本能欲望。在描写革命的主题时，西伯利亚作家的民主主义情绪经常转化为所谓的“游击作风”，这是一种在游击队运动中自发产生的半革命、半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和心理本原，以浪漫主义视角诗化人民运动中的农民暴动。他们乐于迎接沙皇俄国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倒台，但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解生活规律的深刻，对革命的宏大规模和革命家的英勇精神，对支持革命的思想力量，对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前景均认识不足。早在革命前就成名的西伯利亚作家维·希什科夫的中篇小说《乌合之众》（1924），就表现出过分迷恋“游击作风”，将其拔高为民族革命最高体现的倾向。小说将这种“游击作风”体现为主人公农民领袖济科夫所代表的否定一切现存秩序的“济科夫习气”，并且将之与“西伯利亚的普加乔

① Львов-Рогачевский В., «Новый Горький», *Современник*, 1 (1922), с. 159.

② Иванов Вс., «Любимый журнал сибиряков», *Сибирские огни*, 1(1947), с. 139.

夫习气”联系起来：“在创作过程中我想到，‘济科夫习气’和‘普加乔夫习气’是亲姊妹，农民在伊凡雷帝、沙皇彼得、叶卡捷琳娜时代是什么样子，他们中的大部分直到最近的时代还保持是什么样子……总而言之，我要把‘普加乔夫习气’的时代和‘济科夫习气’的时代放在一起比较，让读者有可能做出相应的结论。”^①正因为济科夫的“游击作风”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这种盲目的、残酷无情的复仇信念反而导致了他对游击队攻占城市后的抢劫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伊凡诺夫在《铁甲车》中同样以冷静、严厉、毫不妥协的态度描绘西伯利亚农民的习俗和农民的心理，暴露农民意识的蒙昧和为此感到的痛苦。在被日本军和白军洗劫过的村庄里，一位老人传言白军铁甲车队长是一个一丈多高的巨人，要把老百姓全都杀尽烧光。另一位信奉上帝的老人则谴责游击队的“造反”是“背叛上帝”，引起“圣尼古拉显灵”。在他半神话半想象的模糊意识中，帝国主义干涉苏维埃政权另有一番荒诞的理由，而解决争端的方案也是荒诞的。就连游击队的领导者维尔希宁，实际上也并没有脱离普通农民起义者半神话的思维方式。小说里维尔希宁的渔夫出身令人联想到福音书里的先知，他的孩子们在日军枪炮下奇迹般存活也暗示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在保佑他全家；而他之所以被选为革命司令部主席，也是因为大家“都相信他的‘维尔希宁式’的幸运”（《铁》：19）。他的力量来自于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并与之融为一体：“维尔希宁，他是云，风吹他到哪儿，他就把雨带到哪儿。农民走到哪里，维尔希宁也就在哪里……”（《铁》：38）他也许比别人想得更多些，但依然看不清西伯利亚农民正在为之战斗的革命目标：“唤醒，奔跑，再往后又是什么？”难怪游击队里革命最坚决的“理论家”兹诺波夫表达出对整个游击队行动的不满：“我们干的事情就是破坏一切！破坏再破坏。已经干得讨厌了。什么时候才能建设呢？”（《铁》：33）

农民革命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由农民对革命的理解决定，他们把革命视为向贵族、哥萨克和白军的报复，必须以野蛮的暴力来偿付他们曾经遭到的残酷压迫，以死亡的火来净化生存斗争的自然法则。革命后最早出现的国内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两个世界》（弗·扎祖勃林，1921）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而《铁甲车》在客观冷静地展现暴力方面也毫不逊色于扎祖勃林，伊凡诺夫试图解决的也是当时所有无产阶级作家都在思考和体现出深刻民族性的问题——革命暴力的合法性问题。革命在作家的笔下是俄国历史上农民阶层“自由逃民”运动的精神延续，对“土地的权利”的关注

^① Изотов И., Вячеслав Шишков: Критико-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М.: Сов. писатель, 1956, с. 40, 42.

一直主导着中篇小说中农民参加游击运动甚至不惜冒死投身战斗的动机。维尔希宁反复说着一句“不能放弃土地”，而“好像这话就要裂开了，破碎了，并有一种像台风一样可怕而不可了解的东西就要出现了”（《铁》：47）。伊凡诺夫在农民身上看到了源于西伯利亚大自然的强大力量，确立了人民与这片土地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系。相反，白军则由于脱离土地从而丧失了生命的活力，成为铁甲车这一恐怖机器的附庸和情感贫乏、如同数字般的符号：在白军的铁甲车内，从车厢门、窗框，到军用皮带、手枪盒、纸烟，到处都是数字；铁甲车的指挥官、白军大尉涅泽拉索夫抱怨说：“数字很多，但是意义却很少！”军官们自己也知道，国家已不再需要他们，他们作为“革命的敌人”（《铁》：57）只是“一根子弹带，一个空弹壳罢了”（《铁》：6）。他们失去了思考和判断，靠盲目的仇恨和不正常的性爱幻想摆脱良心的谴责：整个铁甲车“载着几百个满怀忧愁和憎恨的人类的躯体，飞驶到黑暗中去了”（《铁》：13）。

在描绘革命农民与白军的决战场面时，伊凡诺夫同样依靠自然界残酷的物种斗争法则来证明人民运动的正义性，表明决定最终胜利的是“土地的威力”和“强劲的生命力”。俄罗斯学者普列汉诺娃指出：“铁甲车和农民大众之间的战斗，被展现为正在咽气的龙与不畏惧死亡的生活本身的自然力的冲突。铁的外部骨架隐藏着失去一切生命意志的白色力量……打死大尉的不是子弹——摧毁他的是向着机枪冲锋的大众的能量。”^①小说文本充分表现了这一冲突的性质，涅泽拉索夫大尉说：“土地……在咒诅我们……我们是……明天的死尸。我，您，还有车上所有人，全都是送死鬼……”（《铁》：64—65）与此同时，那些为了自己的土地而战的农民游击队员们则前赴后继地奔向死亡，成为坚不可摧的“铁师”，代表着可怕的自然的复仇意志，渴望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像被风吹落的成熟的果子一样，人们倒下来，向土地亲着临死的，最后的吻”，最终，大自然也起了“怜悯之心”（《铁》：102），与他们的母亲妻子一道哭泣，接纳死去的人们。

高尔基曾经建议伊凡诺夫“不要过分粗暴，要相信人，不要只做他们的法官，而要做另外的人，在所有牲畜般的东西背后找寻人性的、善良的东西”^②。在后辈作家国内战争题材的作品中，高尔基的这一嘱托得以实现。《铁甲车》里无论白军还是游击队员的死亡都没有被渲染上情绪性的悲剧色彩，它们的一些细节虽然骇人听闻，

① Плеханова И.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ибири. Часть 2, Иркутск: Изд-во Иркут. гос. ун-та, 2010, с. 74.

② 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Глав. ред.,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ибири. Т. 2.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2, с. 88.

但描写的笔触是冷峻理性的，恰恰是作者这种客观冷静的态度营造出了作品的史诗性和民族革命的正义性——所有这些牺牲、杀戮、毁灭都是为了俄罗斯、整个斯拉夫民族、全世界的和平（《铁》：110）。

四

在西伯利亚发生的民族革命的目标是为了全世界的和平，西伯利亚苏维埃文学的民族性由此也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这种世界性意义首先表现在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的认可和接受。《铁甲车》中的农民游击队员除了要夺取和保护土地外，觉得更“要紧的是必须向这个人解释人生的意义”（《铁》：34）。农民们渴望知道人生的真理，一旦对这真理产生了信心，就会不惜牺牲地向着真理前进。在受到革命鼓动的农民心目中，城里的革命委员会主席泊克列伐诺夫就是“我们应当学习”的“真正的人”（《铁》：52—53），因为他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伊凡诺夫真实地表现了农民头脑里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民族命运的主宰者和未来大同世界的缔造者：“在我们之后，人们一定可以过幸福的生活了吧？……会过幸福的生活的。”（《铁》：76）

游击队员们也同样证明着他们是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者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承担者。在《铁甲车》里有一个向美国人进行“革命宣传”的场景，农民理论家兹诺波夫指着一本宗教课本里的插图解释社会主义革命和帝国主义干涉：“这个，拿着刀的，是资产阶级。你瞧，他的肚子挺着，就像一只只有表链的表。这里，躺在这些大圆木上面的是无产阶级，懂了吗？无—产—阶—级……他，无产者，躺在圆木上，资产阶级要杀他。坐在云端里的是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全是帝国主义的坏蛋。”

（《铁》：30—31）这样的说教天真可笑，却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对革命的理解和国际主义精神以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理念在西伯利亚农民群体中的萌芽。而正是受压迫民族最底层人民的思想认识，决定了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小说中西伯利亚农民的革命动机说服了美国人，热爱生活的力量与朴素的阶级意识的结合产生了激动人心的效果。

但是，最能体现《铁甲车》的世界革命意义的，是小说所塑造的中国人沈彬吾的形象。乌苏里边区的游击运动史上记载着这位光荣的游击队员的事迹^①，他是赤卫军

^① Коваль Г.Ф., «Этих дней не смолкнет слава...», Рудин М.З. Ред., *Партизанские были*, М.: Воениздат, 1958, с. 41-55.

中国独立营共产党员，四次负伤，但并非像小说里描述为夺取铁甲车卧轨牺牲，而是在国内战争后去世。伊凡诺夫把这个参加苏联革命的中国人置于一个神话图景中：他原本有妻子田产，可日本人夺走了他的一切。在他口齿不清的俄语谈吐中，共产主义的理念与神话思维混在了一起，进城镇压起义的白军铁甲车就是他眼里的恶龙。为挡住这条恶龙，他英勇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代表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受压迫的民族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俄罗斯民族致敬。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和诗人高莽先生读到这个情节时曾激动地写道：“辛宾武^①表达了千百万中国人民的心意：对苏联的热爱、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心。多么真挚、多么深厚的兄弟情谊！多么崇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辛宾武虽然壮烈地牺牲了，但是铁甲列车却因此被游击队夺取下来，并使它调转枪口，在驱逐外国武装干涉者战役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辛宾武会在他为之献身的、为劳动者谋幸福的壮丽事业里永生。”^②

在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刚刚结束的时期，西伯利亚苏维埃文学的优秀代表作《铁甲车》便以其民族性和世界性因素的有机融合，为苏联的建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艺术证明，也开拓了西伯利亚文学自身广阔的前景。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 玲

① 沈彬吾的另一译名，文献中只留下这位中国人姓名的俄文音译，中文原名已不可考。

② 高莽《墓碑·天堂》，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82页。